

明代茶文化的特征浅析

闫海青

摘要:明代茶文化繁荣发展,特征鲜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饮茶之法形成了以品饮散茶为主的泡茶法;与儒释道思想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之部分;茶学著作数量为历朝之最;茶具进一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雅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明代;茶文化;散茶;泡茶法;特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7)05-0018-07

中国传统茶文化发展至明代,形成了以泡茶法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的第三个高峰”^{[1](P117)}。这一时期,茶文化繁荣发展,特征鲜明,影响深远,故笔者不揣简陋,试总结其时代特征,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饮茶之法产生重大变革,形成了以品饮散茶为主的泡茶法

(一)从团茶到散茶

明代饮茶之法产生重大变革,跟明太祖朱元璋的一条诏令直接相关。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2](P799)}。所谓“龙团”,是指宋代皇室等上层社会享用的龙凤团茶,“宋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3](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P54)}。宋代不仅要做成团片状,上有龙凤图案,还要“杂以诸香,饰以金彩”^{①[3](朱权《茶谱》P77)},以区别于民间的蒸青团茶。不管是蒸青团茶还是龙凤团茶,它们在制作时都要蒸、碾、揉、压,并添加香料,使得茶叶失去原始的香味、真味,故沈德符评介:“按茶加香物,捣为

细饼,已失真味。宋时,又有宫中绣茶之制,尤为水厄中第一厄。”^{[2](P799)}所谓“绣茶之制”,是指“大镀鬻”,以五色韵果簇[龙凤,谓之绣茶,不过悦目”^{[4](P1023)},实际上是在龙团凤饼上加金箔、五色韵果等以修饰,但再次破坏了茶叶原有的香气,失其自然之性。朱权也认为“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3](朱权《茶谱》P77)}。

与团茶相适应,两宋流行点茶法。饮茶前,先将团茶饼碾成细茶,再磨成粉末即茶粉,备用。又预先将茶盏烤热,点茶时先注汤少许,调成浓稠状,谓之调膏。然后一边注入开水,一边用茶筴在盏中环搅,称为“击拂”,待盏面白色乳沫浮起,是谓茶成。点茶法成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5](P74-78)},随着明太祖诏令的实施和上层社会的引领,逐渐在明代中后期消亡。

明代逐渐流行的泡茶法,却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茶叶的真味、原味,因为泡茶法所用茶型为散茶。明万历年间,张源撰《茶录》,所记“采茶”“造茶”“辨茶”“藏茶”,均是散茶炒青的技术,已无团茶、饼茶之痕迹;许次纾撰《茶疏》,对龙团凤饼与散茶进行了比较,指出“近进制法,旋摘旋焙,香

闫海青,男,滨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天津师范大学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色俱全,尤蕴真味”,并对“炒茶”和“芥中制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又沈德符在总结“茶式”说:“饮茶精洁无过于近年,讲究既备,烹瀹有时,且采焙俱用芽柯,无碾造之劳,而真味毕现,盖始于本朝。”^{[2](P799)}这说明万历时明朝人不再使用团饼茶,以避免“碾造之劳”,且能得茶叶之“真味”。前述明太祖诏令中的“芽茶”即为散茶,从此,团饼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与散茶相适应的泡茶法成为中国饮茶史的主流。

(二)泡茶法的流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明朝初期的饮茶方式仍以点茶法为主,只是所用茶叶为散茶而不是团饼茶。朱权《茶谱》载:“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予故取烹茶之法,末茶之具,崇新改易,自成一家。”^{[3](朱权《茶谱》P77)}从朱权所记“品茶”“收茶”来看,对生茶的加工,做到火焙即可,不再碾压成饼,亦不加香料。钱椿年著《茶谱》记载“采茶”“点茶三要”也表明当时用点茶之法饮茶,只是茶叶为散茶。此种饮茶方式可简略为“散茶点茶法”。至田艺蘅著《煮泉小品》,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变化,“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旗枪舒畅、清翠鲜明,尤为可爱”^{[3](田艺蘅《煮泉小品》P94)}。枪者,茶芽也;旗者,茶叶也。采芽茶时,一旗一枪为佳,用生晒茶直接冲泡,能保留茶叶的自然之味、清新之香,因之,火焙之茶,发展为炒青散茶。这是关于散茶在瓯盏中冲泡的最早记录^{[5](P74-78)}。虽然这时已在十六世纪中叶,但作为明代的一般官吏,用芽茶泡茶并记之,则说明饮茶之法至此已发生变化,已省略过去点茶法的一些繁琐步骤。同时,与田艺蘅同为钱塘人的陈师,撰《茶考》一书,记载了饮茶方式的撮泡法:“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水冲泡的撮泡法已经成为杭州的习俗,可见其在杭州流传时间之长。万历时期还有茶学家撰写茶书,记载了用壶泡茶的技法。如张源撰《茶录》记“泡茶”:^{[3](张源《茶录》}

^{P146)}这就意味着把散茶置于壶中,用壶盛开水以泡之,意即壶泡法。许次纾撰《茶疏》中也提到壶泡法:“未曾汲水,先备茶具。必洁必燥,开口以待。盖或仰放,或置瓷盂,勿竟覆之案上,漆气食气,皆能败茶。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顷,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3](许次纾《茶疏》P164)}因这两部茶书均产生于万历年间,故而壶泡法的起始当在明朝万历年前。壶泡法的兴起,同时带动了制壶产业的起步。

历经散茶点茶法、撮泡法、壶泡法,泡茶法逐渐在明代不同地区流行,成为明清以来的主导性饮茶方式。沈德符称:“今人惟取初萌之精者汲泉置鼎,一瀹便啜,遂开千古茗饮之宗。”^{[2](P799)}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泡茶法的推行,开启了中国制茶、饮茶史的新纪元,对此后的中华茶文化发展及传播产生深远影响。

饮茶形式的变革,使得散茶大行其道,各种新茶类型得到创制和发现。如全发酵红茶,起源于17世纪的武夷山附近。王草堂《茶说》记载:“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3](陆廷灿《续茶经》P447)}此为乌龙茶,青茶之一种。明代散茶取代团饼茶,促进了炒青技术的进步,进而炒青代替了蒸青。人们在研究炒青制法的同时,不断地创造出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等茶类加工方法^{[6](P75)}。散茶的推广,丰富了茶的种类,提高了茶的质量。

二、明代茶文化与儒释道思想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之部分

(一)明代茶文化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明代茶文化在发展、繁荣过程中必然和儒家思想相碰撞、适应,进而融合为一体,表现为明代茶文化中讲究茶境之和、茶道之礼、茶学之思。

茶境之和是说采茶、制茶、饮茶过程中要做到与环境和谐,与人和谐,与内心和谐,这与儒家追求和谐思想是统一的。儒家非常看重人际关系

的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还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的学生有子也曾经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7]^[18]而现存的明代茶书中,大部分为儒士所编,深刻体现着儒家的和谐思想。朱权《茶谱》指出品茶时要与朋友“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对品茶的室内、室外环境提出明确的要求,必须处于一个和谐静雅的状态下进行品茶。谈话内容也要求脱离世俗,尽量“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3]^[朱权《茶谱》77],这同时也对交谈对象提出了要求。张源《茶录》“火候”条曰:“烹茶旨要,火候为先。……过于文,则水性柔,柔则水为茶降;过于武,则火性烈,烈则茶为水制。皆不足于中和,非茶家要旨也。”^[3]^[张源《茶录》145]这是对烹茶火候提出的要求,即过于文或过于武均不能达到中正平和之标准。徐献忠《水品》对品茶用水亦有和谐之气的要求:“古称醴泉,非常出者,一时和气所发,与甘露、芝草同为瑞应。……醴泉食之令人寿考,和气畅达,宜有所然。”^[3]^[徐献忠《水品》104]明代儒士对品茶之人亦提出要求,以达到与人和谐,如陆树声《茶寮记》中有“人品”一节,指出“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落胸次间者”^[3]^[陆树声《茶寮记》118];屠隆《茶笈》也专设“人品”一节,认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3]^[屠隆《茶笈》138];许次纾《茶疏》对品茶时机和内心提出了要求,“心手闲适,披咏疲倦,意绪纷乱,听歌拍曲,歌罢曲终,杜门避事”^[3]^[许次纾《茶疏》164],等等。

茶道之礼是说在以茶待人、与人品茶过程中要做到儒家所强调的礼仪规范,以彰显尊卑、主客之别,朋友、知己之情。礼是孔子思想的起点,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礼仪,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明代的茶道中,处处可见儒家“礼”的思想。朱权《茶谱》中就记载了茶事中的待客之礼:“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曰:‘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曰:‘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

陈再三。”^[3]^[朱权《茶谱》77]明代品茶要求逐渐形成“十三宜”和“七禁忌”的说法,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对礼仪的要求。如对泡茶者的妆容、姿态、双手、气息、韵律,茶具的使用、摆放等有不同的要求。茶道之礼传达的是中国传统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茶学之思是指明代茶学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处处体现中庸思想与道德要求,追求中庸之道与高雅品质。明代茶书中对采茶的记载非常多,采茶一般要注意时节时辰、手指姿势、茶芽嫩熟程度等等,其实质是掌握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节奏,泡茶时对沸水火候的要求也体现适宜、折中之中庸思想。儒家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8]^[1299-300]如何激发人们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达到比较完善的境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途径。在明代茶文化中,亦有这种修养的途径。明代茶人经常以茶品类比人品,将儒家的道德追求融入其中,前述陆树声《茶寮记》和屠隆《茶笈》均设“人品”一节,就很能说明问题。在田艺蘅《煮泉小品》的《跋》中,蒋灼与田艺蘅有关于天下名泉和恶泉的争论,表面上是品泉,实际上是借品泉表达儒家对人生品格的追求。

(二)明代茶文化与佛教思想

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是在我国却影响深远。佛教传至明代,因朱元璋有意整顿佛教,加强管理,加上明代理学、心学的发展,明代佛教发展出鲜明的特色。以明代名僧元贤为代表,提出“教必归理”的宗教观,拉开了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序幕,后袞宏、真可、德清及智旭等四大高僧同倡“三教同源”论,把三教合一思潮推向高峰。明代茶文化的发展与形成,有佛教僧人的贡献,融入了佛教“清静”的思想。茶文化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来就有所谓“寺必有茶,僧必善茗”的说法。明代多有名山古刹盛产名茶,僧人擅长焙制,引风雅之士趋之若鹜,纷求山茶,或坐而论道,或品茶吟诗。而产名茶之区又多名泉,僧又好客,如明诗所载虎丘山寺:“虎丘寺外野僧家,客子过时请吃茶。”^[9]^[卷17《采茶歌》]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载:“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

是茶始于一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制法。其后于松萝结庵,来造山茶,于庵焙制,远迹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3](冯时可《茶录》P201)当时高僧坐禅讲经于此的甚多,文人骚客拜访暂居的也非常多。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中记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10](子部·杂家类)等事,其中,“煮茗”事居第二,可见僧人对茶文化的喜爱,“茶禅一味”当有道理。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欲望。佛教徒在参禅打坐、修养身性时正可饮茶提神,驱除睡意。明代著名画家沈周云:“吴僧大机,所居古屋三四间,洁净不容唾,善瀹茗。有古井清冽为称,客至,出一瓯为供饮之,有涤肠滯胃之爽。先公与交甚久,亦嗜茶,每入城必至其所。”^[11](子部·杂家类)沈周名震当代,既嗜茶又解茶艺,故记载僧人大机其人其事。其父亦受僧人之影响,沈周实承其家风,佛教徒因精通茶文化而影响世风如此。明代茶文化的推广与发展与僧人有很大的关系,称茶文化有三分佛气,实不为过。

(三)明代茶文化与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亦与明代茶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陆树声《茶寮记》“茶侣”条记载:“翰卿墨客,缙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3](陆树声《茶寮记》P118),其中,“缙流羽士”即指寺庙中的僧人与道观中的道士。只是,有明一代,佛教比道教更为兴盛。然道家隐逸思想、清静思想在明代茶文化中也有体现,如选择清新脱俗之境品茶,饮茶时对水的选择,远离闹市等等。陆廷灿《续茶经》曾记载有一徐道人,“居庐山之天池寺,不食者九年矣。畜一墨羽鹤,尝采山中新茗,令鹤衔松枝烹之,遇道流辄相与饮几碗”^[3](陆廷灿《续茶经》P447)。隐逸于庐山,九年不食,只饮茗茶,与鹤为伴,道家思想与茶文化合为一体。又记云泉道人从平日品茶中悟出茶理来,认为茶有肥瘦之别:“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3](陆廷灿《续茶经》P426)这说明道士不但嗜茶,且精于茶艺,体悟当然深刻。道家对水的评价较高,认为“上善若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明代茶文化中对水的要求也比较高,

常有专论述及。田艺蘅曾经指出,虽有名茶,还需配合名水,也惟有如此才能尽茶之真味;而水晶中以泉水为最上,泉水中又以山泉为最佳,相水之法有所谓:“山厚者泉厚,山奇者泉奇,山清者泉清,山幽者泉幽,皆佳品也。”^[3](田艺蘅《煮泉小品》P94)明代茶文化中对水品质的要求,对清新脱俗环境的追求,与道家思想中的远离俗世、清静无为的思想相契合,与儒释两家共同构筑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三、茶学著作数量为历朝之最,推动饮茶之风更盛

明代是古代茶学著作刊印最为繁荣的时期。当今学者们基于茶书判定标准的不同看法,对明代茶书数量的研究结论略有不同。根据形成认识的时间早晚,现予以举例说明。王河在《明代茶学著作述评》一文中认为,明代茶事专著有50余部,其数量相当于从唐至清时期茶书的一半^[12](P254-259);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等学者认为,唐至清代,现初步确认的茶书为188种,其中完整者96种、辑佚28种、佚书书目64种,而明代有79种^[13](P66-71),现存47种;陈椽在《茶业通史》中指出,自唐至清代,包括失传而有书目可查者在内的茶业专著计118部,并列明代茶书目录约37种(不含失传目录)^[14](P2-3)。茶书数量较多是明代茶学繁荣的表现之一。

明代茶学著作众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茶学著作作者大部分来自江浙地区,这反映了江浙地区不仅是全国的经济重心,还是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区域(见下页表格)。

明代江浙地区饮茶之风大为盛行,这么多的文人儒士总结积累茶叶的产制技术和烹茗技艺,著书立说,不仅推动了明代茶文化的发展,也标志着中国茶文化中心区达到了鼎盛时期,并对全国其他地区产生了辐射影响。

茶学著作的大量出版,虽然受当时印刷出版界盛况的影响,有流行重刊或辑录前人作品的趋向,但也有不少茶书是作者自己的感悟和积累,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作。从上述可知,明代茶书涉及到茶叶、茶史、茶艺、品水、茶诗、茶文甚至运水契约,其内容从采茶、制茶、焙茶、品茶、观茶、

明代茶书作者(部分)籍贯统计表

茶书	作者	明代籍贯	今籍贯	茶书	作者	明代籍贯	今籍贯
茶疏	许次纾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洞山芥茶系	周高起	江苏江阴人	今江苏江阴市人
茶泉论	高濂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茶话	陈继儒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煮泉小品	田艺蘅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水品	徐献忠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茶考	陈师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煎茶七类	徐渭	绍兴府山阴人	今浙江绍兴人
新刻茶谱五种	胡文煥	浙江钱塘人	今浙江杭州人	茶寮记	陆树声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茶录	程用宾	浙江新安人	今浙江淳安人	茶录	冯时可	江苏华亭人	今上海松江人
茶经外集 茶谱外集	孙大绶	浙江新安人	今浙江淳安人	茶经	张谦德	江苏昆山人	今江苏昆山人
茶说	屠隆	浙江鄞县人	今浙江宁波人	茶略	顾起元	应天府江宁人	今江苏南京人
茶谱	顾元庆	江苏长洲人	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	运泉约	李日华	浙江嘉兴人	今浙江嘉兴人
茶录	张源	吴县包山人	今苏州洞庭西山	茗笈	屠本峻	浙江鄞县人	今浙江宁波人
茶董	夏树芳	江苏江阴人	今江苏江阴市人				

茶品、水品到茶寮、茶侣、茶具,几乎包含了我国茶文化的所有方面。这些茶书的丰富内容,体现了明代人对茶的认识、运用、欣赏及对茶文化的丰富与总结。民间保留茶叶自然属性的泡茶法逐渐成为主流,因其程序简洁,追求真味,很快得到普及,推动着茶馆业在民间的重新振兴。明代茶文化融入了儒释道思想,明代士人、贵族、仕宦、平民百姓等阶层都能从茶文化中找到性灵舒展的精神境界和寄托。茶人团体的出现,便是这种茶文化发展的表现。共同爱好的人组成团体,共同研讨、探究茶文化,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同时推动明代茶文化的发展。茶学著作的出版、流传,在这个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记载前人的茶韵遗风对后世文人在茶文化上的追求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茶具进一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雅的时代特征

明代用散茶进行冲泡的泡茶法简化了程序,使得一些茶具如碾茶、罗茶、煮茶器具均无用武之地,被束之高阁,这促使茶具相应变革,一批新的茶具品种出现。明代中期,随着泡茶法在社会上的流行,人们不再崇尚金银茶器,而是使用陶质茶具、瓷器茶具,社会审美情趣发生变化。这一时期,茶具进一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雅的时代特征。

(一)茶壶成为茶具中的主角,紫砂壶异军突起。

宋代点茶法盛行时所用茶具主要有茶盏、茶碗、汤瓶(又称执壶、注子)、茶托、茶碾、茶罗等。其中汤瓶或执壶主要用来盛水和注水。当泡茶法登上历史舞台,直接在壶中泡饮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宋代虽有茶壶之器,但在煮茶、点茶、斗茶过程中,汤瓶或执壶的作用不大,而明代泡茶法,必须依靠茶壶这一最为要紧的茶具,故明朝人开始重视茶壶的制作、款式、色泽,甚至茶壶上面显示的书法、绘画、纹路,等等,茶壶成为茶具中的主角。与茶壶相配套,明代主要茶具有茶杯、盖碗(杯)、茶洗、奉茶托盘、茶匙等。茶杯主要用于配套茶壶品茶,盖碗(杯)主要用于泡茶及饮茶,茶洗主要用于洗茶。这些茶具的使用与宋代相比,已经简化了不少。明代茶道文化中,茶壶、茶杯、盖碗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故而明代陶器、瓷器茶具的生产主要以这三种器具为主,生产技艺也大大提高。

明代茶具革新中最耀眼的是江苏宜兴紫砂茶壶的成熟与兴盛。宜兴紫砂茶壶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与泡茶法相契合。明代饮茶之风追求茶叶的真味、自然之味,明代茶道与儒释道思想的结合,也追求一种自然、清静、超脱的饮茶意境。二是实用性。“茗壶为日用必需之品,阳羨砂

制,端宜淪茗,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侈,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15]^[P3]既无金属茶具艰涩口感,又可以保留茶叶的原香,故宜兴紫砂茶壶大行其道。三是制壶名家辈出,其艺术风格受到世人的大力追捧。

明人周高起专门为宜兴紫砂壶著书,写作《阳羨茗壶系》,该书是研究宜兴紫砂茶壶的重要著作。书中对紫砂壶的评价是“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并认为为保留茶叶之自然香味,最好用小茶壶,“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淪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3]^[周高起《阳羨茗壶系》P319]。文震亨《长物志》记载:“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16]^[P418]文震亨认为紫砂壶不侵夺茶叶的香气,且茶壶久置不用没有宿杂气,泡茶仍得原味。

紫砂茶具工艺独特、造型典雅古朴,泡茶汤色澄清,是传统文化中的艺术珍品,享有“世界茶具之首”的美誉,这也和紫砂壶原料的诸多优良性能有关系。按照现代人对紫砂陶土的分析,我们可知紫砂陶土是一种水云母—石英—高岭土类黏土,含铁量高,有良好的可塑性,经高温烧制后,产品不易变形;紫砂陶是一种双重气孔结构的多孔性材质,气孔微细,密度高,具有较强的吸附力和透气性;紫砂泥料分子排列呈鳞片状结构,因此紫砂壶冷热急变性能好,热胀冷缩率低,不易炸裂等等。紫砂壶独具的这些品质,让其大放光彩并形成了紫砂壶艺文化。陶质茶具的生产成本低,技术成熟,普遍受到百姓欢迎,遂逐渐平民化。

从茶盏汤瓶到茶壶的革新及紫砂茶壶文化的兴起,是明朝茶文化独有的特色。

(二)弃黑盏,尚白釉,景德镇青白瓷进一步平民化

宋代人用点茶法饮茶、品茶,很容易在茶盏中形成白色泡沫,人们在欣赏时易于和茶盏的颜色相比较,故宋代建盏黑瓷非常流行,很受宋代皇室和上层社会欢迎。明代逐渐流行的泡茶法

为保留茶叶原香,使绿茶茶汤保持了原有的颜色,这使得明代人对茶具鉴赏的标准发生变化,即“弃黑盏、尚白釉”。屠隆《茶笈》中记载:“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3]^[屠隆《茶笈》P137]这似乎能说明时人鉴赏标准的变化,洁白如玉的茶盏能观察茶色,而建盏已不能用。随着这一鉴赏标准发生变化,以生产青白釉瓷器闻名的景德镇,顺应了历史潮流,在明代成为全国瓷业中心。

明代瓷质茶具,主要是白瓷和青花瓷的茶壶和茶盏。白瓷茶具大多洁白无瑕,正好映衬茶汤的色泽,适合冲泡各类茶叶。而青瓷茶具因其色泽青翠能增益汤色,适宜用来冲泡绿茶,在明代也受到了欢迎和追捧。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在江西景德镇设立工场,专造皇室茶具。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的白瓷彩绘茶具,造型新颖,清丽多姿,釉色娇嫩,白里泛青,令人爱不释手。朱权《茶谱》指出:“茶瓿,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取其松纹兔毫为奇。今淪窑所出者与建盏同,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3]^[朱权《茶谱》P80]其中,饶瓷是指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茶具,用来泡饮绿茶最能衬托茶汤的颜色。同时,白瓷茶又具有传热、保温性能适中的特点,大受百姓欢迎。故景德镇虽为皇室专造茶具,但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不可小觑,瓷质茶具逐渐得到推广,进一步平民化。景德镇瓷器与江苏宜兴紫砂茶壶有“景德镇瓷宜陶”之说,可见其已深入人心。

明代茶具不仅设计科学,经济实用,使用方便,而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实用、淡雅的艺术特征可以与传世的书画相媲美,是我国陶瓷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茶文化繁荣发展,特征鲜明,饮茶之法形成了以品饮散茶为主的泡茶法;与儒释道思想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之部分;明人撰写的茶学著作数量为历朝之最;茶具进一

步简化、平民化,形成实用、淡雅的时代特征。

注释:

①以下茶书除特别说明者均引自叶羽编著《茶书集成》。

[参考文献]

[1]章传政.明代茶叶科技、贸易、文化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叶羽.茶书集成[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清)陈元龙.格致镜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丁以寿.中国饮茶流变考[J].农业考古,2003,(2).

[6]陈椽.茶叶贸易学[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1.

[7]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0.

[9](明)彭孙贻.茗斋集:卷17采茶歌[M]//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10](明)乐纯.雪庵清史[M]//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11](明)沈周.客坐新闻[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2]王河.明代茶学著作述评[J].农业考古,2002,(4).

[13]章传政,朱自振,黎星辉.明清的茶书及其历史价值[J].古今农业,2006,(3).

[14]陈椽.茶业通史[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15]李景康,宾虹.阳羨砂壺图考[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16](明)文震亨.长物志[M].陈植校注.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郭玉芳

